

延 边 文 史 资 料

第 三 辑

政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 金海镇

延边文史资料
第三辑

政协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
吉林省内部资料准印证第5439号
(内部发行)

*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5年11月第一版 1985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工本费：0.85元

目 录

纪念关俊彦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功垂长白名永存

——关俊彦同志在延边的主要活动

.....金 石 (1)

怀念老战友关俊彦同志.....文成章 (14)

纪念陈翰章将军牺牲四十五周年

白山青松

——陈翰章将军生平事迹

编者的话..... (22)

陈翰章将军纪念碑文..... (23)

陈翰章将军传略.....温 野 (24)

血气方刚的青年.....范广明 (42)

反日演讲员.....姜德埠 (50)

投笔从戎.....范广明 (52)

不寻常的旅客.....范广明 (53)

怒杀诱降者.....温 野、臧 秀 (58)

寒葱岭伏击战.....温 野、臧 秀 (64)

功垂长白名永存

——关俊彦在延边的主要活动

金 石

七十五年前，正当日寇的侵略魔爪伸进延边，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难、家难甚重的时候，有一位爱国青年胸怀救国救民的远大抱负，毅然放弃轻闲的工作和舒适的生活，只身来到无亲无故的延边，创办普通教育，兴办各项事业，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热忱支持延边各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先后在这里忘我奋斗二十二年，贡献了闪光的青春和智慧。他就是解放后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第一任专员关俊彦。

在关老诞生一百周年之日，我披阅书刊、文献资料中有关他的记载，追思那过去的岁月，虽不曾相识这位谱写延边地方史志上重要一页的革命前辈，但他在延边所经历的许多事情，犹如耳闻目睹，敬慕之心油然而生，缅怀之情亦难压抑。

“我是延吉县人”

关俊彦，字选庭，又名毅如、立川，是锡伯族人。他的祖先，是大兴安岭讷河苏完高原（注1）人，明朝初年移居吉林省境内松花江畔的伯都讷（今扶余县境内），曾入八旗兵籍，为正黄旗瓜尔佳氏。清康熙年间，清廷下令锡伯族分三批南迁时，又移至辽宁省开原县西大湾屯定居。他生于一八八五年三月二十九日（农历辛酉二月十三日），是关裕新的长子。那时家有薄田五垧，一家三代九口人自耕自食，尚能温饱。

关俊彦的青少年时期，正是清廷日益腐败，列强加紧瓜分

中国，人民的苦难更加深重的时候。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他目睹过清军屡失战机，不堪一战，一再溃败，虽海陆军下级官兵英勇作战，辽东人民奋起抵抗，亦不能挽救败局，终以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告终。十年以后，日俄战争爆发，两个外国军队竟在中国的疆土上开战，他又目睹过十个月的兵劫。铁岭、开原之间，东西横宽一百五十里的地带，田野荒芜，流亡载道。他眼望着国土被蹂躏，人民遭涂炭，忧国忧民，夜不能寐。七岁时上了几年私塾的关俊彦，二十岁那年就读于开原城内具有进步思想的名秀才张子纲书馆。他因受张先生的谆谆教诲，更因受到当时社会影响和进步思潮的熏陶，逐渐摒弃了登科中举，显宗扬名的功利思想，接受了爱国爱民的新思想，开始博览新书，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〇八年，关俊彦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奉天省立农业学堂，遂留学堂当了园艺科技师，月薪五十元，工作轻闲，前途有望，生活舒适，经济充裕。

但是，两年以后，关俊彦却放弃这一切优越条件，自愿来到延边，着手进行了颇为艰苦的开拓性工作。是什么内在因素使关俊彦这样做的呢？就是他那爱国爱民的坚贞思想和开发延边，反日救国的远大志向。在奉天农业学堂工作时，有一天关俊彦到图书馆翻阅书刊，偶得吴禄贞著《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抄本。这是延吉边务督办吴禄贞，在初戍延边时，呈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的述职报告，不仅阐述边务持论严正，侃侃不挠，而且叙述农、林、矿和运输等各业，亦分析透彻，足资参考。他又看到匡熙中所著《延边领土问题之解决》一文，均爱不释手，早读夕惟。他想到，各族人民杂居的延边，地域广阔，物产富饶，却人烟稀少，经济落后，亟待开发，绝不能让日寇覬覦之野心得逞。从此，他随时留心收集延边地图和有关延边的政治、经济动态，博览介绍延边的书刊，以备后日实用。一

九一〇年七月，延吉道筹办初等农业学堂，派奉天农业学堂毕业生左丕显回母校聘请教师，没有人愿意去。关俊彦获悉，欣然应允，连家也没回去看看，便随左丕显来到了延边，一直在这边陲之地工作了二十多年。

关俊彦初到延边的头几年，人地两生，延边教育、绅商各界对他不大了解，开展工作并非易事。但他毫不退缩，施展处事才干，逐一克服难关，使工作很快有了新局面。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原奉天农业学堂老师、新任北京袁世凯政府农工商部部长陈振生的急电，通知他已荐任该部农林司技师，月俸一百六十五元，即日来京就职。他的同窗好友籍汉梁亦来信，催促他赶快赴任。关俊彦有此意想不到的京官厚禄，许多人既羡慕又致贺，都劝他勿失良机，马上动身。可是他并不动心，立即复电，婉言谢绝。他在致籍汉梁的复信中，表白自己不能离开延边的心迹时，写道：“延吉急待开发，需人孔亟，且万不能坐视已经收回的主权重新落入日寇虎口（注2）。当此之时，更不能计较个人之得失，置延边百万生灵、大片国土于不顾！”关俊彦的这一行动，大出当时延边各界人士之所料，一时传为佳话。早在民国初年，就有这样一位爱国青年，不求高官厚禄，不图享受和安逸，矢志扎根于边疆，把青春献给延边的开发事业，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八十年代的今天看来，依然是令人钦佩的。

在延边工作和生活的漫长年月里，关俊彦同延边各族人民患难与共，携手战斗，建立了不可分离的深厚感情。他热爱延边的山山水水，热爱延边的各族人民，以自己能够在这里成家立业为荣，常常不无自豪地说：“我是延吉县人！”而解放后，他干脆把籍贯改为“延吉县”。他在自传里曾写道：“我虽生于辽宁省开原县，但离开学校即来吉林省延吉县工作，后又在这里参加了革命，并与这里的王玉洁结婚，孩子都生于延吉县，

我将自己视为延吉县人，遂改为延吉县籍。”仅此一斑，足见他热爱延边，热爱延边各族人民的感情，是多么纯朴、真挚！

“反日兴学的开拓人”

关俊彦来到延边以后，在兴办教育事业上倾注了不少心血和精力。在他以前，也就是一九〇五年韩日缔结“乙巳保护条约”后，迁至延边的朝鲜爱国人士和汉族中的有识之士，在龙井、延吉等地兴办反封建的新学，从事了排日教育和文化启蒙活动。可以说，延边的教育事业，是在反对封建主义斗争中兴起，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文化侵略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因此，那时的延边教育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鲜明的排日性质。关俊彦充分肯定当时延边教育事业的这一特点，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兴学反日为宗旨，积极创办普通教育。延吉道农业学堂停办之后，关俊彦于一九一一年底应绅商姜渭清之聘，创办勇智乡（注3）公立两等模范学堂。他任校长仅一年，学生人数就增加一倍，成绩显著。关俊彦的办学才干初露锋芒，声誉日增，遂教育、绅商各界人士咸与往来。一九一三年以后，他先后担任龙井村商埠局小学校长、和龙县第一两等小学校长、和龙县劝学所所长（即县教育局局长）、延吉道立中学学监等职务，均擘划细密，施教得法，成绩斐然。

一九二四年，关俊彦应延吉道尹陶彬举荐，再次就任和龙县教育局局长，便着手整顿全县教育系统的紊乱状况。他从各地聘请有爱国思想的知识青年，又接受一批北平香山慈幼院毕业的师范生（内有不少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渐次将一些不称职的校长、教师逐一撤换，使全县教育界增添朝气蓬勃的新生力量，面貌焕然一新。接着，关俊彦又组织水平高的教师，编撰垦民（即朝鲜族人）课本，创设职业班、识字班、师范班，招收大批朝鲜族贫苦儿童入学，减免学杂费；增建校舍，

开办食堂、宿舍，给远道走读生供食宿；充实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加强文体活动，举办运动会、成绩展览会，组织各校师生互相参观学习；采取实际步骤，提倡和鼓励垦民自办乡村小学。在县立第一小学里，他亲自组织师生开展了各种丰富多采的业余活动：办图书馆，收藏大批左翼作家鲁迅、蒋光慈、茅盾的作品，经常举行读书会、演讲会；依照社会上的组织形式，成立学生自治会、合作社、邮政会等，开展既有趣，又颇有意义的社会公益活动和勤工俭学活动；创办师生话剧团，演出郭沫若的《棠棣之花》、反战话剧《可怜闺里月》以及儿童歌舞剧《葡萄仙子》、《月明之夜》、《麻雀与小孩》，等等，使学生们不仅得到书本上的知识，而且得到了了解社会实际的机会，经受各方面的锻炼。这一系列整顿和改革，使得全县教育越办越好，吉林省教育厅督学来视察、评比，和龙县多次被誉为延边各县之冠。一时间，吸引许多青少年入学就读，连日本人所办的学校，也因学生纷纷转学，难以继续维持下去。他们苦心经营的奴化教育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日本人对关俊彦恨之入骨，却因他廉洁奉公，任人唯贤，光明磊落，声望日增，不敢贸然寻衅，只在背地里干些造谣诬蔑的勾当，这反而使他的威望大增。广大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无不赞誉关俊彦为“反日兴学的开拓者”，他是当之无愧的。

在关俊彦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大批优秀青年，后来有不少人成为共产党人、革命者。他们之中，在民主革命时期献身、立功者为数不少；解放后在党和国家各部门里担负重要职务者亦不乏其人。这是关俊彦爱国爱民、报国为民思想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他为延边做出的一个特殊贡献。他整顿改革教育事业的气魄和睿智、治学态度和办学经验，至今仍然是值得学习的。

“只要是搞抗日活动，我都要支持！”

关俊彦不仅是延边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又是当时

延边深孚众望的一位社会活动家。他来延边以后，非常注意广泛接触各界仁人志士。二十年代以后，主动接近共产党人、革命者和各界进步人士，经常和他们相处共事，也结识许多朝鲜独立党人和朝鲜的爱国志士，同他们一起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积极开展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一九一五年五月，“五·九”国耻（注4）消息传来，关俊彦不胜悲愤，同李铎、倪华山、任静忱等人一起，联合延边教育界和各县商民，举行了反对袁世凯卖国行径的示威游行，翌年又通电声讨袁世凯策划洪宪帝制的复辟丑剧，进行了声势浩大的反袁斗争，直至袁死才罢休。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率先带领师生响应，进行了“三罢”（罢教、罢课、罢市）斗争，坚决要求取消卖国的“二十一条”，反对日帝修筑天图铁路，掠夺天宝山矿产资源，发动延边各界广泛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他还组织和参加过一九二七年声讨日商捣毁延吉海关行径（注5）的斗争、得到广大农民群众拥护的“四六分毗”运动（注6）、一九二八年十月反对出卖“五路”权的请愿活动（注7），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他那爱国爱民的坚定立场，敢于向邪恶势力斗争的无畏气概。

这期间，关俊彦受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思想影响，逐渐接受了马列主义的革命理论，实现了从进步的民族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他眼界更开阔了，志向更远了。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共东满区委在龙井召开秘密会议，曾讨论过关俊彦的入党问题，决定由区委书记周东郊、宣传委员孙绂生等负责，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不久周东郊被捕，中共东满区委遭到破坏，这一决议未能实现（注8）。然而，关俊彦已经把自己视为共产主义战士，他把慷慨接济穷苦乡民当做本分，更把支持、掩护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革命活动看做己任。一九二八年东北易帜（注9），不久和龙县亦设国民党县党部，

一时从县长到各局、科长尽入国民党，形势逆转，妖风四起。设在县教育局隔壁的国民党县党部，采取所谓“防共”措施，严加监视关俊彦等人的活动。而关俊彦仍无所畏惧，毫不动摇。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声望，巧妙地运用合法斗争方式，明里与敌周旋，暗中支持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和农民的锄奸斗争。不料事机不密，一九二九年末，和龙县县长熊伯群奉令决定，要搜捕县立二校校长赵志刚（共产党员，解放后任邮电部副部长）、教员董昆一（共产党员，解放后任延边第二任专员）、朴松杰（共产党员，解放后任中共延边地委委员）等革命师生二十余人。关俊彦挺身而出，极力反对搜捕师生的决定。他不顾被牵连的风险，给被列入搜捕者名单的师生每人发些路费，设法使他们安全离开了和龙。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时局更趋紧张。日寇费尽心机，利诱威逼，欲使关俊彦屈服。然而，他正气凛然，断然拒绝，竟毅然参加了反帝大同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关俊彦怀着反日救亡的同情心，那样热忱、真挚地支持和掩护朝鲜独立党人和爱国志士的革命活动。他常说：“反帝反封建不分国家、民族；无论是谁，只要是搞抗日活动，我都要支持！”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朝鲜爆发全国规模的反日民族独立运动，影响迅速波及延边地区。三月十三日，龙井的朝鲜族群众举行了盛大的反日示威。就在同一天，关俊彦联合一些汉族中的进步人士，发起了支持朝鲜族反日民族独立运动的声援活动。他曾多次慷慨解囊，帮助朝鲜革命者和爱国志士，或安全转移，或潜伏活动，使走者有川资，留者有食宿、有职业，许多人躲过追捕，免于遭难，继续从事反日救国活动。仅一九二一年后的两年间，他就先后帮助朝鲜独立党人黄金龙、金玉亭去黑龙江省宁安县，南世极去安图，方正学，白奎焕、孙山等人安全来往于延吉、龙井、头道沟、老头沟等地。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一天，关俊彦从他的挚友、朝

鲜独立党人孙山处获悉，前两天朝鲜独立党代表在古茂山开会，决定派出二十人到汉城取得联络后，分赴各地开展活动，只因没有盘缠不能动身。他二话不说，立刻到崇信公司，在自己的名下取出三百元朝票，又考虑到路上日本军警盘查极严，孙山携带巨款去不安全，便亲自登程去朝鲜古茂山附近的鹤浦，按密约将钱交给了孙山的父亲。这位老人十分感激，热情地请关俊彦留宿，言谈中向他索诗留念。关俊彦欣然命笔，写了五律一首：“鹤浦停车晚，山乡泡苦茶；村姑羞掩容，野老话桑麻。苛政猛于虎，流民失所家；中朝欣携手，早日见光华。”字里行间浸透着中朝两国人民为着共同的目标并肩战斗的兄弟情谊。

关俊彦回来后，同事们埋怨他不辞而别，突然“失踪”，他笑着道歉之后，说：“我想，做人就该这样：爱我的祖国，也爱朋友的祖国；爱我的同胞，也爱朋友的同胞。此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以天下为公，求世界大同吧。”几句朴实的话语，表达了他那宽广的胸怀，高洁的品德和远大的志向。

“《民声报》的好社长”

二十年代前后，关俊彦抱着开发延边，利国利民，抵抗日寇经济侵略的信念，同一些进步的商绅合作，积极兴办了各项事业。一九一九年，他首先筹资创办了延吉新文书社，经营印刷业务和文教用品；这年年底，他协助延吉道尹陶彬，兴办茂森采运公司，任采运部长，经营木材的采伐、运输；一九二二年筹办图们江水利公司，自任经理；翌年开办裕兴运输公司，任总务部长，为延边地区的经济开发事业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东奔西走，不遗余力。而他联合延边各县教育、工商界人士，创办《民声报》一事，则是值得载入延边地方史志的。

一九二七年春，关俊彦为了维护主权，申张正义，同姜渭清等各界知名人士商榷创办报纸一事，得到一致赞同。他们议定，将要问世的报纸须代表民意，反映民之心声，故定名为《民声报》。关俊彦随即投入了《民声报》社的筹建工作。他带领县一校的师生，在和龙、龙井、延吉等地，举行歌舞、话剧义演，他自己既当导演又当演员，还动员他的两个儿子也参加演出，广泛地开展了募捐活动。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四县各界人士和广大民众也踊跃捐助。关俊彦用筹集的资金购买房子和印刷机，添置其它必要的设备，终于创办了报社。他又以社长的身分，领导了社务。报社的总编孙佐民和编辑陈涛（陈日新）、苏子元，文艺版责任编辑周东郊，都是中共党员，而周东郊又是延边的第一个中共党支部——龙井村支部和东满区委（注10）的创建人之一。在关俊彦和这些共产党人的主持下，《民声报》每日出朝、汉文版一大张，积极宣传抗日救国，及时揭露日寇在延边各地设置警察、特务网，加紧进行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阴谋活动；呼吁延边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同舟共济，共御外侮；开辟“文艺”、“工人园地”、“妇女”、“儿童”等专栏，广泛传播了新文化、新思想。这家报纸，是二十年代后期延边地区唯一的进步报纸，而报社则成了其后不久建立的中共延边地区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摇篮。

那时，在延边地区的日本人中的上层人物，对《民声报》又恨又怕，他们所办的《间岛新报》惊呼：“《民声报》和北平香山慈幼院来的教师是两大魔影！”但是，延边的广大工农群众和各界人士，热情赞誉《民声报》是“民之喉舌”，称关俊彦为“民之木铎”，“《民声报》的好社长”，如今看来亦无过誉之嫌。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寇法西斯统治的强压之下，发行三年多的《民声报》被迫停刊了。这年年底，关俊彦交卸了和龙县教育局局长和《民声报》社社长职务。他在

最后一期报纸上发表的《停刊词》中写道：“……同人等明知覆巢之下势无完卵，然犹与敌抗争，坚持数月（指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时间——编者），其间摒却敌人种种威胁利诱。同人等志在宁为玉碎，不求瓦全，决不甘心俯首事敌也！”表示了有血性的中国人威武不屈的傲然骨气。停刊那天，关俊彦在报社最后一次职工大会上讲话时，又说：今天，问世仅三年多的《民声报》停刊了，但只要日寇尚在我神圣的国土上，反日斗争任何时候不能停止。我本人也将离开延边，但我的心是永远留在延边的，永远不会忘记延边各族同胞的。让我们在反日反封建的旗帜下继续奋进，斗争到底，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一番话，说得慷慨激昂，声泪俱下。闻者无不动容，感奋至极。

“一生奋斗晚节忠”

一九三二年二月初，关俊彦离开了生活、工作二十余年的延边。正如关俊彦自己所说的，他没有停止反日斗争，没有停止革命事业。二月，关俊彦带领许多革命者、同事和学生，历尽旅途艰辛，抵达北平。五月间，关俊彦离开北平到太原，在山西省建设厅任秘书兼视察员。一九三三年，他奉命去临汾、洪洞、赵城，调解三县水利纠纷，随后成立临、洪、赵三县通利渠管理局，被三县人士公推担任了局长。从延边去关内的革命者、同事和学生闻讯，纷纷前来投奔，他依然热情接待，一一安置，各得其所，并引导他们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一九三六年八月，关俊彦由董昆一、李常青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他接受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去甘肃省平凉专署，在专员刘兴沛手下任秘书，秘密开展了原东北军政人员反蒋抗日的思想工作。同年十二月，关俊彦署理隆德县长，正值北上抗日的红军在会宁大会师后，路过平凉地区，已向六盘山进发，落在后边的小部队和零散人员，被东北军六十七军截

留许多，尽交县里看管，他却随收随放，一个没留。平凉专署专员刘兴沛知道后，大为不满，即令关俊彦停职。他遂回北平，继续从事地下工作。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关俊彦打入伪华北教育总署编审室任语文组主任编审，忠实地完成党组织交给的每项任务，掩护了许多我党地下工作人员。一九四二年七月，关俊彦因叛徒告密，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备受酷刑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保守党组织的秘密，保持了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一九四四年十月，关俊彦出狱后，与同时出狱的难友一起，筹办大夏贸易公司（实为我党地下交通站），表面上经营食盐、牛皮等杂货，实际上筹集药品、橡胶制品、电讯器材等急需物品，资助边区，传递情报，输送进步青年到边区参加抗战，接济被难同志家属的生活，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寇投降后，关俊彦经张家口，辗转来到东北，不久回到了阔别十三年的延边。这年十一月二十日，在延吉召开延边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吉林省延边政务委员会，设立延边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从此，延边各族人民破天荒第一次当家做了主人，延边大地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建立一个人民自己的政权。年已六旬的关俊彦担任第一任专员，为肃清日伪残余和土匪，实行民主政治，加强民族团结，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日夜操劳，忘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九四六年四月九日，关俊彦调离延边，先后担任了吉林省人民政府民政厅长、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省民盟副主席等职。他坚决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族、各界人士，为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新贡献。在十年动乱中，关老虽惨遭迫害，仍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忠于党忠于人民，保持了共产主义战士的晚节。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关老含冤逝世，终年八十六岁。

粉碎“四人帮”以后，关老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二日，中共吉林省委和省革命委员会在长春举行了关俊彦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仪式由省委书记高杨同志主持，省委副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于克同志讲了话。于克同志在讲话中，对关老的光辉一生作了公正的评价。

纵观关老的一生，象他这样一位清朝末年那个黑暗时代的有志青年，从忧国忧民，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奋起抗日罔顾身；继而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参加革命，坚持革命，几经沧桑，忠心如一，坚定不移跟党走，一生奋斗晚节忠，确是堪称楷模的。尤其是，他以革命的一生，在我们面前树立了热爱边疆，扎根边疆，为边疆的开发事业贡献一切的榜样；树立了热爱延边各族人民，搞好民族团结的榜样；树立了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榜样。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光明磊落的一生。他人格高尚，品德高洁，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他远见卓识，志向远大，胸怀坦荡，高瞻远瞩，一生追求真理，总是善于团结党内外同志一道工作；他情操坚贞，赤胆忠心，廉洁奉公，两袖清风，一生升官发财的机会很多，却甘愿为革命过俭朴生活，虽道路崎岖，命途多舛，依然冰心在壶，忠贞如一，艰苦奋斗半个多世纪，把一生的精力和智慧无私地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他是锡伯族人民的骄傲，延边各族人民的骄傲。他虽然与世长辞已经十四年了，但他那可钦可敬的光辉形象，令人感奋的崇高楷模，将永远留在延边，留在延边各族人民的心里，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去迎接更加灿烂、美好的明天。

注释

① 关俊彦所遗手迹：“由铁岭西三台子抄来之家谱载：‘我辈发祥之地为多拉吉逼拉，束瓦尼哈达’。锡伯语里，“多拉吉”，意为“内”；“逼拉”，意为“河”（或江）；“束瓦尼”，音译为“苏完”；“哈达”，意为“高原”（或山峰）。具体地点，当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东接大兴安岭

山脉，西近海拉尔的高原地带。沈阳市太平寺锡伯家庙碑文：“锡伯部族祖居海拉尔东南扎兰陀罗河流域，嗣后移居墨尔根、齐齐哈尔、伯都讷等地”。

② 一九〇七年，日帝挑起所谓“间岛问题”事端，竟在龙井设“间岛派出所”，肆意派遣军警、特务，侵犯我主权。延吉边务督办吴禄贞初成延边时，与日本侵略者交涉，针锋相对，据理抗争，迫使日帝承认清朝政府对延边的主权。

③ 勇智乡公立两等模范学堂旧址，在今龙井县东盛乡平安村一队原“同泰源”烧锅东侧。该学堂后来改为县立第二小学。

④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并声称如果袁世凯承认，日本就将赞助他当皇帝。五月九日，白日做洪宪帝梦的袁世凯，不顾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答应除第五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国人称之为“五·九国耻”。

⑤ 一九二八年初，延吉海关奉令征收进口货物附加税，日商拒不缴纳，还蛮横地捣毁海关仓库，抢走了货物。延边各县爱国人士和广大民众极为愤慨，举行示威游行，向日本驻龙井领事馆强烈抗议，并推举关俊彦、姜渭清、倪华山、孙善堂为代表，向日方交涉，迫使日商认错，赔礼道歉，补缴税款，赔偿了一切损失。

⑥ 本世纪一、二十年代，朝鲜族农民在延边各地开垦出来的农田，尽归当地地主所霸占。他们再从地主手中租田耕种，交租百分之八十。二十年代后期，延边各县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减租减息斗争，提出“四：六”分成，只向地主交租百分之四十，而百分之六十的收获归农民，称之为“四六分毗”运动。关俊彦曾带领师生下乡宣传，组织广大朝鲜族农民发动过这一运动。

⑦ “五路”，指敦(化)老(头沟)、长(春)大(赉，今大安)、吉(林)五(常)、洮(南，今洮安)索(伦)、延(吉)海(林)五条铁路。东北军阀头子张作霖曾以“五路”修筑权作抵押，向日本借款。张作霖死后，日帝仍坚持要此权。一九二八年十月，延边各界推举关俊彦、姜渭清、曹梦九、刘彭龄等人，组成请愿代表团，由关俊彦率领，到吉林省议会，省工商联合会，继而到沈阳、南京，求见张学良、胡汉民、孙